

编者按 刚刚召开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在全国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推动文艺创新发展的背景下,10月15日至17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办公室指导,检察日报社、山东省潍坊市检察院主办,最高检新闻办公室文化工作处、方圆杂志社和山东省高密市检察院承办的第23届全国检察文学笔会暨全国检察机关文化品牌建设经验交流会在山东省高密市举行。会议期间举办了“从莫言的‘检察十年’谈起”文学漫谈活动,与会嘉宾围绕莫言在检察日报社工作时的创作和经历,畅谈心得体会,展望检察文化未来发展。在此,将漫谈内容加以摘编,敬请关注。

在“文学的原乡”遇见莫言

——从莫言的“检察十年”谈起

主持人:莫言文学馆中收藏着大量珍贵的照片。大家之前都知道莫老师在检察日报社工作过,但是在看到这些合影后才发现,原来莫老师参与了这么多检察系统的活动,这些老照片令人倍感亲切。莫老师曾说过,在检察日报社工作的十年是他创作的黄金十年,下面有请莫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当年在检察日报社的经历。

莫言:“检察十年”指的是1997年到2007年这十年。那时候我很年轻,很有活力,刚到报社,当时领导说要安排我当一个刊物的主编。我说让我当刊物的主编,还不如让我干一点具体的事情。他说那你到影视部(现为“最高检影视中心”)去吧。当时影视部已经有三个人,我们就准备拍一部反映检察官生活的电视连续剧。第一步是采访,深入生活,我们深入各地检察院进行采访,还采访了最高检的一些领导。为了避免在写作中出现严重的法律常识性错误,我还找了很多有关法律的书,恶补相关知识。这样一个体验生活、深入生活、学习法律知识的过程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总之,我对这段生活记忆尤深,很多场面仿佛就在眼前。我们的电视剧《红树林》虽然收视率不高,没有取得很大成功,但为后来的检察题材影视作品起到了探索铺路作用。《人民的名义》《巡回检察组》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就,我相信与我们当年的探索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在检察日报社工作的十年,我亲眼见证也参与了“检察文学”这个概念从无到有,创作队伍从弱小到强大,素材由少到多的过程。我跟检察系统内很多文学爱好者、文学写作者后来都保持着长期的联系,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尤其令我记忆犹新的是,每年的检察笔会都把检察系统的文学爱好者和通讯员集结在一起,检察系统的文学爱好者们每年见一次面,感觉很亲切,有很多创作的体会一起交流,创作出来的作品可以共同欣赏,这不仅促进了个人成长,也为报社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今后的检察文学笔会,如果我有时间,我一定会参加,因为每次见到你们,我都会想起当年,感到人也变年轻了。

在检察日报社的十年给我提供了大量素材,前段时间在北京巡演的话剧《鳄鱼》就来源于我在检察日报社工作时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我也给检察日报社的朋友们看了初稿,让他们提了很多意见,首先保证作品不要出现法律常识方面的错误。事实证明,话剧还是比较成功的,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也为我下一步继续写检察题材、法律题材的作品增强了信心。

主持人:我到检察日报社工作后,有段时间不断地翻旧报纸,看到了陆天明、刘震云等著名编剧、作家的名字,当时特别惊讶,作为行业报,居然聚集了全国一大批文学界的大腕。下面请孙丽编委为我们介绍一下。



图①:1999年,莫言在广东为学员签书,《红树林》一书是莫言创作的一部以检察官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图②:2007年,莫言在检察日报社办公。
图③:1999年,莫言为河南省检察系统优秀通讯员培训班授课。
图④⑤:参加笔会的检察文学爱好者们到红高粱影视城、红高粱抗战馆进行文学采风。

孙丽: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能跟大家分享那非常美好的十年。大家都知道莫言老师从部队过来,其实是带着一定级别的,按照惯例应该相应地给他安排一定的职务,但是莫老师当时婉辞了这个安排,他说只想专心地去写作,当时的领导也尊重了莫老师的想法。我觉得莫老师身上特别令我佩服的一点是,虽然他婉辞了职务,但是他真正地、全方位地把自己当成了报社的人,常常和我们一起探讨检察文学的概念、检察文化的边界,一点一滴都充满了感情。

检察文学笔会已经举办了23届,莫老师在报社的十年里,每一届笔会都参加了。报社每年都会举办全国通讯员培训班,每一次莫老师都会亲自去给通讯员们授课。此外,莫老师还经常到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去调研,去体验生活,所以说,莫老师真的是全方位、全身心地投入报社的各项工作中去。

我认为,莫老师对检察文化的最大贡献是推动检察文学的概念从无到有,探索检察文学的本质以及检察队伍在检察文学方面应该如何作为。现在我们谈到检察文学,会认为这就是一个当然存在的概念,它也是检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莫老师刚来的时候,我们在探讨这个概念的时候曾经有很多摇摆。

莫老师曾提到,“检察工作是检察文学的富矿”,莫老师也身体力行地从“富矿”里挖掘了很多东西。莫老师还曾提到,“从事检察工作是深入人心的捷径”,检察系统创作者从事检察工作、从事跟检察官相关的工作都是抵达人心的捷径,以及“检察文学要贴着人物走”等富有深意的论断,都为检察文学概念的奠基、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

莫言老师的贡献不仅在于更新理念,也在于提升了检察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莫老师的引领下,文学界一流的作家纷纷深入检察生活一线,投身于检察题材的文学创作之中。正是当初这些丰厚的文学积淀,成为催生《人民的名义》《第二十条》

等这些现象级检察影视作品的富壤。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塑造更多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也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要求。莫言老师在检察日报社工作的十年中,不但创作了大量作品,还曾持续出访交流、参与文学翻译相关工作,徐则臣主编的作品在年轻一代小说家中被翻译的比较多,接下来请他从这个角度谈谈自己的感受。

徐则臣:我先谈谈参观莫言文学艺术馆的感受,最让我感动的有三部分:一是莫老师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下称“军艺”)学习的经历,二是在检察日报社十年的工作经历,三是莫老师做慈善的板块。其实这三部分内容我都很熟,我觉得在这三个板块的照片里,莫老师出镜时的表情是最丰富的,整个人的状态是最好的。莫老师是一个非常重情的人,因为重情,莫老师才会在检察日报社工作时与同事们的关系都非常融洽、和谐,离开报社这么多年后,也依然和同事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军艺的师生情,检察日报社的同事情谊,以及莫老师耗费巨大精力去做慈善这三个板块的内容,也在莫老师的作品中充分展现出来。正所谓,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他的作品就是什么样的。

在检察日报社的十年里,莫老师的状态是特别放松的,因为放松,所以创造力勃发,创作了大量著名的作品。我工作的《人民文学》就发表过两篇莫老师非常重要的作品:一篇是短篇小说《月光斩》,发表于2004年10月,这篇小说还获得了当年人民文学奖中的短篇小说奖。还有一篇是中篇小说《变》,发表于2009年10月。莫老师写《变》的时间也正是他在检察日报社工作的时间,我们能够看出他的创作发生了变化。这十年对莫老师的重要影响除了收获同事情谊,还积累了大量关于写作的素材,尤其是《鳄鱼》,我个人认为这部剧会成为莫老师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虽然只有几万字,但它大大拓展了当代戏剧写作的边界,当下少有剧本写得如此之远、如此之深。

这十年也是莫老师走向国际非常重要的十年。检察日报社为莫老师提供了一个非常宽松、自由的环境,让莫老师在创作的同时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去”。“走出去”不仅对莫老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整个中国文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以来的这段时间,中国文学“走出去”步子迈得很大。在这个时段,莫老师作出了非常好的表率 and 引领。

另外,由于莫老师和检察机关的特殊关系,他创作的作品,无论是否涉及检察题材,都能对检察系统的创作者产生重大影响。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加入进来,进而形成一种创作传统,若干年后,我们可能会看到一支力量强劲的检察文学创作队伍,他们的创作也将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主持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九三阅兵让人热血沸腾,也让《红高粱》这类抗战经典作品更受关注。您的小说《红高粱》以抗日战争时期山东高密为背景,展现普通民众在民族危亡时刻的觉醒与抗争,并且后来被拍成了电影。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过程藏着不少趣事吧?据说还有一张流传很广的照片,是您和张艺谋、

姜文等人的合影。这张照片是在什么背景下拍摄的?

莫言:这张照片就是在艺术馆前面的村子里拍的。那是1987年8月,高粱还是绿色的,我问张艺谋:“高粱还没红怎么拍?”他说你不懂,高粱红了以后就硬了,风吹的时候就不会摇摆,现在虽然是绿高粱,但我们将来可以加上滤镜。巨大的风扇吹着高粱地,像大海一样掀起波浪,所以高粱必须是绿色的。

后来我们就请剧组的主创人员来家里吃饭。小说里描写到了“抻饼”,但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抻饼”。“抻饼”就是双手抻着一张饼这样吃,饼是白面饼,擀得很薄,烙熟之后,里面可以夹上鸡蛋,卷上大葱,抹上酱。很早的时候,这个地方比较荒凉,有很多土匪。土匪自己当然也没法在田野里开火做饭,他们会把种地的人扣住,让另外一个人去报信,说他们要多少张“抻饼”,赶快送来。村里的农民就会赶快和面、煮鸡蛋。当时要说一个人长大了没有出息,就说你长大了,搞不好要吃“抻饼”,就是搞不好要当土匪。

吃饭的时候请来了张艺谋、姜文、巩俐,还有杨凤良,大概七八个人。我们家唯一的一个热水瓶——当时热水瓶属于贵重物品,被姜文一脚给踹碎了。他当然不是故意的,发出一声强烈的爆炸声,我赶快跟他说这是大吉之兆,预示《红高粱》电影在国际上要“爆响”,后来果然很响。后来,我见到姜文多次提起这件事,姜文说我陪你一个,你别提这件事,我说不,不要你赔,就是要保留这个话头。

这部电影是1987年拍完的,1988年春节期间,我在供销社的一个仓库房里写作,我的堂弟在社区当会计,他拿着一张《人民日报》,兴高采烈地来向我报喜,说《人民日报》发了整整一版“《红高粱》西行”,张艺谋拍的电影《红高粱》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金熊奖,这也是中国电影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国际A级电影节的金奖,所以也算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全国轰动。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街小巷都响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样的歌声。我记得有一次我从高密回北京,下车之后,听到广场上的小伙子喝得半醉,一手提着酒瓶,一边唱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是将近40年前的一些往事,《红高粱》小说也创作了整整40年了。

《红高粱》小说是在1985年的冬天创作出来的,在1986年的第3期《人民文学》上发表。这篇小说在当时引发了比较普遍的反响,在电影拍出来之前就反响很大,原因在于它采取了另外一种写法,与《地道战》《地雷战》《烈火金刚》等抗战红色经典不同,《红高粱》从民间的、个人的角度来反映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所以它跟当时的同类题材的小说相比,应该是别具一格的,由此引发了读者的广泛关注。

创作确实需要有想象力,想象要有基础,要有物质的基础和精神的基礎。物质的基础是刚才讲的高粱、大地、故乡、乡亲以及真实的历史事件,精神的基础则是人民群众当中所蕴藏的这样一种伟大的、顽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困难中站起来,在危险中获得力量的源泉。

主持人:据我所知,来自全国检察系统的骨干作者从接到通知那天起,就自发地开始写和红高粱、高密东北乡有关的诗歌,目前已经收到了

一批,可见我们作者的创作热情之高。接下来就想请教黄国辉主任,您作为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能不能为我们的作者培养提提建议?

黄国辉:近期,正好中国作家协会也在筹备“作家回家”相关活动,与此相关,我觉得对于文学爱好者,特别是对于每个喜欢莫言老师的读者来说,高密也可以说是他文学上的原乡。来到高密,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切感,我感到自己真的是从作品中走到了现实世界,走到了一个自己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高密的话题,离不开文学,离不开莫言老师。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个细节。莫老师是1997年开始到检察日报社工作的,我也是1997年参加工作的。我和莫老师在工作时间上的巧合,让我忽然感到一种契合,仿佛我在中国作协这些年的文学之路,和莫老师的工作与创作经历,在精神的深层产生了呼应。这也让我想到自己从事文学工作这么多年,一直不断受到文学的滋养。文学对每个人的成长都会有特别大的帮助,我认为不管对谁来说,这种滋养都是宝贵的,虽然潜移默化但都会帮助一个人塑造他的人格和精神,也从而会体现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里。

未来,我们愿意和检察系统一起多开展一些培训方面的合作。比如可以一起组织作家们到基层去采风、创作,开展文学实践活动,实现互相促进。我也希望检察系统能有更多创作者不断地涌现,也能加入中国作协的队伍里来,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检察文学的发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们作协也愿意成为其中的一份力量。

主持人:李一鸣书记不仅是作协的领导,还是一位评论家,请您从评论家的角度,谈谈莫老师的“检察十年”。

李一鸣:莫言老师在致辞时谈到,十年检察时光给了他环境、氛围、题材、灵感。这十年的黄金岁月,我想每一天都是像金子那样珍贵。莫言老师在检察日报社工作的十年也推出了他最重要的几部作品,如《生死疲劳》《檀香刑》等等,这给了我很多启示。文学工作如何做?我想到了莫老师提到的环境,想到了环境和创作里包含的三组关系。

第一组是环境与心境。创作是一个作家复杂的精神劳动,需要作家心灵的自由和丰盛,需要给作家创造一个宽松的、温暖的环境,这有利于作家平心静气、舒适自意,然后才能进入“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创作状态,我们感觉当年的检察日报社是如此的宽松、如此的温暖,这对作家创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组是作品与场景。莫言老师提到在检察日报社工作的十年给了他创作题材,也就是说给了他生活的场景。我想作家也应该像莫老师那样到生活的场景中去,无论是陌生的生活,还是熟悉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不仅发现生活、书写生活,而且创造生活。

第三组是创作与愿景。当时检察日报社的领导同志对莫老师说,你也可以写检察题材的文学作品,结果莫老师就写了《红树林》,包括现在的《鳄鱼》。这种愿景对作家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工作应该给作家目标和期许,给创作以政策和机制,比如扶持机制、作品转化机制等。如果说滋养心境是解放精神生产力,创设场景促进精神生产资料的增长,构筑愿景就是完善精神生产的生产关系。从理论上来说,可以从解放精神产品的生产力、生产资料、生产关系这三个层面看到这黄金十年对莫老师的重大意义,这也是我们文学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能够从其中得到的有益启示。

(文稿统筹:本报记者 王渊 高可 《方圆》记者 黄莎 方菲)